

論《古白話詞匯研究論稿》

許威漢

上海師範大學

徐時儀《古白話詞匯研究論稿》是第一部古白話詞匯的成功論述。

自從1985年在武漢召開第一次近代漢語討論會，1986年在上海召開第二次近代漢語討論會以後，近代漢語研究日益被重視。90年代信陽師院、湖南師大、河南大學等相繼召開了近代漢語討論會，漢魏以來白話詞語的研究也有較大進展。

近代漢語的討論，較早接觸到的內容有近代漢語上下限問題、近代漢語分期問題等。後來討論的內容較多的是詞匯問題。在呂叔湘、劉堅、江藍生、蔣紹愚等學者的倡導並身體力行的研索下，成果喜人。但綜觀目前語言學界古白話研究的情況，空白點還相當多。徐時儀學有專攻，長期從事古白話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條分縷析，鑽研彌深，並力求理論的駕馭和方法的運用納入科學軌道，終於完成此重要論稿。

徐時儀《古白話詞匯研究論稿》(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版)是繼作者《慧琳音義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11月版)佳作之後的又一力作。全書43萬多字，凡十二章，以自己研究心得融會貫通前賢時秀已有研究成就，益以己見，促使研究引向更深層次。每提出自己見解，皆緊扣漢語特點，言必有據，進行力所能及的論證。

全書主要內容涉及八大方面，限於篇幅，本文未便詳述，茲各例析其要義，以窺一斑。

1、關於古白話書面語系統

語言的系統，在空間結構和時間結構上存在有序性，佈局和發展有其規律性。作者從這一概念出發，先論先秦口語方言與文言文的形成，再論先秦以後口語方言與古白話的形成，指出白話文的形成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口語基礎上逐步影響文言文，增加文言文中的白話口語成分，進而形成與文言文相峙的反映實際口語發展的古漢語另一書面語系統(會參該書10頁)。這正表明古白話書面語系統形成的有序性與規律性，亦即表

明古代漢語在發展變化中形成文言文和古白話兩個支流的實際。具體說來，周代和周代以前所遺留下來的書面語和秦代以至漢初的某些書面語，大致是和當時口語相近的。漢代以後，各時代文人的書面語模仿先秦而輕當世，行文逐漸脫離當時的口語，成為一種特殊書面語。這種特殊書面語就是文言文。與此並駕齊驅，從漢魏以後到「五四」前，都有著一種與口語基本一致的書面語。這種與口語相近的書面語就是古白話。文言文與古白話是古漢語的兩個分支，然而彼此並沒有截然的鴻溝。漢代以後的文人寫文章喜歡使用秦漢以前書面語裏的詞匯與語法成分，還喜歡模仿秦漢以前文章的腔調，這就反映出了文言文的人為性。可是不同時代的漢語畢竟是一種語言，後來的文人寫文章，一面仿古，一面不由自主地把當時口語的某些成分用到他們所寫的文章裏去，這就使文言文又具有綜合性（綜合各時代語言成分）。越到後來，綜合性越來越大，它不僅積累了某些時期口語裏的詞匯和語法的某些成分，而且積累了歷來許多時期口語裏的詞匯和語法的某些成分。就連「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的韓愈（韓愈把包括語言在內的文章之事看成是「退化」的，這是一種反歷史主義的觀點，留待另文評說），他本人寫作的詩文，一方面較嚴重地脫離當時的口語，另一方面也還常出現方俗語詞（這是韓愈的語言實踐自我批駁了「退化」的歷史觀）。比如韓愈《南山》詩有「團辭試提挈，掛一念漏萬」句，「團」字就無法從先前用義來解釋（「團」較早見於金文，《說文》：「團，圜也，從口，專聲。」）。「團」是當作「估量」、「猜度」理解，「團辭」就是仔細估量怎樣用詞，即斟酌、推敲用詞。這便是韓愈用的方俗詞義。韓愈詩文中類似現象屢見不鮮。這意味著後世詞語在古代書面語中的使用是語言歷史發展的必然，文言文具有人為性和綜合性不言而喻。儘管韓愈每詆「齊梁及陳隋，眾作等蟬噪」，甚而他本人也被譽為「文起八代之衰」，歷代眾多碩儒更力挽文言文的統治，但文言文終究只能暫時處於主流地位，白話文依然循著社會的需求和自身職能的發揮而存在和發展。再專就古白話書面語自身系統而言，它的逐漸演變在整個歷史時期內並不完全相同，口語成分不間斷地增加，展現了量的逐漸增長的歷程。唐宋時古白話已逐漸取得文學語言的地位，沿至清末，古白話書面語系統中的口語成分的量的積累已經到了相當豐碩的程度，進而贏得了現代漢語書面語的正統地位。古白話的發展基本上反映了先秦以後漢語口語的發展面貌。白話文書面語系統的形成在漢代已發其端緒〔會參12頁〕。往後的《世說新語》的「半文不白」則繼其端緒而益滋，逮及唐宋以降已趨蔚為大觀之勢。這從表面上看，漢語書面語蔚為語體大觀，看似僅是人們話語表達方式發生變化，而從深層次透視，實隱含著人們價值觀念的更新。從漢唐以來各個時期文獻典籍所反映的一些語言變化，不僅可以觀察到古白話演變發展的進程，而且也體現了人們有意識地選擇語體的傾向，反映了人們對自身價值的認識和對言說方式的選擇〔會參14頁〕。

2、關於古白話詞匯的分期

古白話詞匯的分期，基於詞匯自身的發展性和人認識的客觀性，而認識常因人而異。本書先介紹了各家說法，然後提出自己的見解，認為古白話這種語體萌芽於漢及魏，成熟於晚唐五代。大多數佛經譯文、變文俗講以及後來的話本、小說、雜劇和南戲劇本等都屬於古白話系統，也有一些介於兩大系統之間，如較為通俗的詩、詞、曲等。因而，漢語史的分期只能以漢語反映某一時期的本質特徵為原則。各個時期之間有過渡，有聯繫，不必用絕對的觀點將它一刀兩斷〔會參18頁〕。如實指出由於古白話在演變為現代漢語書面語系統的過程中總是處於「旁系」（姑且這樣說）地位，因而造成古白話文獻中長時期的文白夾雜現象，以致形成了有關中古、近代漢語分期之間難分難捨的複雜狀況。基於這一事實，作者在呂叔湘和其他語言學者申論基礎上將古代漢語切分為文言文和古白話兩大系統〔會參19頁〕，按照古白話由微而顯、由受制於文言而終於取代文言的發展線索，將古白話詞匯分為露頭、發展、成熟三個時期，即漢到唐的早期白話（白話滲入書面語）、唐到明的中期白話（白話書面語系統在形成中）和明到清的晚期白話（白話與文言並存）〔會參21頁〕。眾所周知，語言的發展是漸變的，不是爆發的，這樣的分期自然更切合語言的歷史事實。

3、關於古白話的重要文獻

文獻包括具有歷史價值的圖書文物資料以及與某一學科有關的圖書資料，這是任何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本書專章細敘具有口語色彩的文獻而又融入自己研究之所識，其價值在一般單純的文獻介紹之上。對一些專書，如《朱子語類》和《慧琳音義》在語言研究上的價值作了必要的肯定，並認為大抵可將《朱子語類》看作是朱熹與其門人講學問答的實錄，如實反映了當時文人的口語概貌〔會參74頁〕；《慧琳音義》可視為具體地反映了源於周代的上古漢語和以話本為代表的中古漢語的中間狀態的語料〔會參117頁〕。繼在敘述宋儒語錄詞語考釋中，進而就自己研究《朱子語類》之所得作了深層探討〔會參263-270頁〕。

本書沒有停留在一般對白話的審視上，在闡發了古白話文獻的整理和校勘時，別見洞天，指出古白話文獻語料的選擇和鑒別同版本密切相關。在語言史的研究中，最要注意的是避免把後一時期的語言現象當作前一時期的語言現象，進而就《辭源》和《漢語大詞典》所引《舊五代史》中的「賤」字作了考證，認為難以據此將「賤」字出現的最早年代定在薛居正編著《舊五代史》的宋代〔會參138頁〕。持之有據，言之成理。

本書的目光聚集於核心而又兼及邊緣，指出古白話時期正是中國歷史上的漢族和周邊民族頻繁接觸交往甚至融合的時期，所以周邊非漢族的語言也必然會對漢族發生影

響，研究這一時期的漢語詞匯，必須考慮到各種民族語言的相互影響因素〔會參139頁〕。書中在徐復《歹字形聲義及其製作年代》所論基礎上根據敦煌文獻的記載對李思純《說歹》和蔣冀騁《近代漢語詞匯研究》的說法作了補正，證實唐末五代時「歹」已被用來表達「惡劣、壞」的意思〔會參140頁〕。於是本書認為從理論上著眼，要弄清楚古白話詞語的面貌及其發展變化，必須對古白話的諸方言以及古白話時期周邊非漢語的狀況有比較清晰的了解〔會參141頁〕。對「歹」的考察正是一個與此相關的有效嘗試。

隨著視野的拓展，本書明確指出面臨文獻信息載體向網絡化、電子化發展的趨勢，古白話的研究也將逐步以新技術、新方法取代傳統的研究方式〔會參141頁〕。誠然，重視傳統、繼承傳統、宏揚傳統而又不為傳統所膠固，以新時代意識駕馭現代化工具馳騁學林，當是今後研究取得高效率的重要環節。

4、關於具體詞語研究

歷來具體詞語的研究，往往跟訓詁學相結合，又跟語法學、修辭學等相聯繫。在這些方面，乾嘉學者對上古詞語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而時賢對中近古漢語詞語研究的發明發現亦頗不乏其例。別的暫且不說，僅就偏義複詞而言，便常寓映襯的修辭作用。如「先帝常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後漢書·何進傳》）的「成敗」是由兩個反義語素構成的複詞，其主要含義是「敗」，「成」僅起映襯作用，使更突出「敗」的嚴重後果。有些類義複詞也有發展為偏義複詞的。如「國家」的「國」本來指諸侯統治的政治區域，「家」本來指卿大夫統治的政治區域。「國家」連用，有時分指「國」和「家」：「諸侯貳（離心）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範宣子）之家壞。」（《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國家」凝固成複詞，則是個統一的概念「國」。本書就俞敏《化石語素》一文所舉「國家」等詞作了探討〔會參217頁〕，著重指出偏義複詞的詞義已不是兩個單音詞（語素）意義的簡單相加，也不是兩個單音詞（語素）組合而成的詞組義，而是以其中一個單音詞（詞素）的原來意義作為複音詞的詞義，另一個單音詞（語素）原有的詞匯意義則「虛化」為一種構詞成分的語法意義，實際上也就是兩個單音詞組合而成的詞組虛化為一個偏義複音詞〔會參218頁〕。偏義複詞裏的某一「語素」，雖無實在的詞匯意義，卻具有構詞和修辭作用，有時還有強調語氣或表達某種感情色彩的功能，甚至有時語境上也需要這種模糊性。由此也可以說，正是偏義複詞在表義上的某種模糊性使它具有特定的活力〔會參219頁〕。這些敘述，似乎可以由繁返約，然而為求具體闡明，還是不惜筆墨。不僅如此，本書對「睡覺」一詞的剖析，更是不惜潑墨如雲，以利鈎玄探微。本書在鄭莫《漢語詞匯史隨筆》所論基礎上進一步指出「睡覺」本是「睡」和「覺」兩個單音詞組成的詞組，由於「覺」在語境上後發生，「睡」和「覺」結構位置有先後，且「睡」寓「強勢語感」，「覺」在使用過程中受「睡」感染，產生組合關係中的同化現

象，原義為「睡」所隱含，遂由實而虛，由表「醒悟」的動詞演化為表「睡一覺」的動量詞「覺」。至宋代，「睡覺」這一結構中「覺」的詞義已完全消失，成為構成表示「睡眠」的並列複音詞的一種語法功能上的構詞補足成分，凝固成一個偏義複詞。偏義複詞中一個語素義的演化失落或變得無足輕重以致可以「忽略」，這並不意味著它所含這一語素義原承載信息功能的喪失，只不過是它在詞匯表義系統內部調整中，詞與詞的分工有了改變，成為語法功能上的構詞補足成分，因而偏義複詞的失落原義的語素在語詞中仍有標誌區別的作用。「睡覺」演化為偏義複詞後，「覺」原承載的語素義所具有的信息功能並未完全喪失，而且正是它原來所含的語義導致了「睡覺」一詞內部結果的變化，從而「睡覺」在現代漢語中漸被納入動賓結構，「覺」居然成了名詞素〔會參216-217頁〕。類此，言雖多，卻詳發人之所略，以資隅反。

本書對「我」、「儂」也具別有見地的理解。「我」是強式的第一人稱代詞，從甲骨文(由兵器形名借音)時代開始一直沿用到現在。作者認為潘悟雲《釋儂》所揭示的「儂」由指第一人稱到指第二人稱的演變過程的灼見，並由此進一步推測：北方移民從中原地區將「我」帶到古吳語中後，「我」成為通稱，「儂」則帶有感情色彩。「我」和「儂」也就有了表謙敬功能的分別，從而引致了吳語中的「儂」逐漸由第一人稱代詞演變為第二人稱代詞〔會參231頁〕，甚具有卓識。

本書放眼詞匯與語法的相互聯繫與影響，意識到「語法形式詞匯化」和「詞匯單位語法化」對詞匯研究具有普遍意義，指出漢語詞匯語法化的演變使漢語產生了一批在語言表達中被認為是「起血脈和關鍵作用」的虛詞。詞匯語法化可以是詞義的由實變虛，也可以是語義功能的由實變虛，詞義和語義功能的虛化實際上也就是語言演變中的語法現象，它在語言演變中的作用不能低估。常用單音詞大多數是多義的，而由它們組成的複音詞大多數是單義的，因而，單音詞組合成的詞組凝固成複音詞，實際上也就是多義的單音詞抽象虛化成為單義的複音詞，即由多義虛化為單義的詞匯意義的演變，同時也可以看作是由詞組虛化為詞的一種詞匯語法化〔會參241頁〕。漢語中的複音詞大多數是由詞組演變而成的(就連某些連綿詞如「曖昧」之類也由原來兩個語素凝結而成)，那怕複音虛詞也大多先由詞組演變而成，進而演變為虛詞，其由詞組演變為複音虛詞同樣也是一種詞匯語法化現象〔會參242頁〕。

5、關於古白話詞語專書研究

20年代初何仲英撰有《水滸傳釋詞》(《教育雜誌》13卷6期、8期、10期，1921)，後來引起人們一些商討。40年代汪馥泉的《水滸詞典初稿》(《學術》1輯，1940)、余嘉錫的《水滸傳的俗語》(《經世日報·讀書周刊》9期，1946)也算是對《水滸傳》語詞的專書訓釋。這

些基本上是嘗試性的。繼此之後，余嘉錫1948年出版了《金元戲曲方言考》(商務印書館)。同一時期，應該著重指出的，是張相1945年撰成1950年出版的《詩詞曲語辭匯釋》(中華書局)。張書對詩詞曲中習用的特殊語詞詳引例證，精釋意義(兼釋虛詞與實詞)。釋詞方法常以詩證詩、以詞證詞、以曲證曲或彼此互證求其涵義、用法，析其情味、語態，追溯其源流變化，當推為同類書中的白眉。其所舉「遮渠、隔是、斷句」之類，今已罕用甚至不用；「可能、當家、問事」之類意義與今不同。類此二者，在詞匯上的創發價值就很大，其他精彩獨到之處尤多。50年代專書詞語研究文章發表30餘篇，60年代初中華書局出版了《小說詞語匯釋》，之後由於社會原因(「文化大革命」)暫無嗣響，80年代以來專書詞語研究提到新的日程，論著迭出。本書特地對張相的《詩詞曲語辭匯釋》作了較為客觀公允的評價(會參275-276頁)，並指出張書把研究範圍擴大到唐宋以來的詩詞曲，專把詩詞曲的語言材料作為研究對象，彌補了由古代到現代的一長段時間中語詞嬗變的空缺，將更接近當時人們口語使用實際卻一直為人們所忽視的詞語歷史地再現在人們面前，開闢了古白話詞語研究的新領域，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傳統訓詁學在此後幾十年的走向(會參188頁)。生機勃勃，有如把人們由沙漠引入清流之境。

6、關於詞義考釋的多渠道滲透

語言史是思維發展史的記錄。語言的產生對思維的發展起巨大的推動作用，思維的發展又促使了語言的反覆與完善。概念以簡約形式凝結於詞語之中，詞兒的產生與語素的結合一般都有其理據性。除了象聲詞(這是第二信號系統裏雜入第一信號系統，另當別論)，詞義是語素按一定邏輯關係結合而成。這可以說是新詞能夠產生並為社會接受的必要條件。由於語言或其所反映的客觀事物在歷史的長河中發生了變化，以致古白話中許多詞語在今天看來顯得理據不明。從研究這些複詞的整體意義或其中所含語素的意義著手往往是揭示其理據的有效途徑(會參305-307頁)。事實誠然如此。

本書指出語言三要素語言、詞匯、語法有機聯繫的同時，指出古白話語詞形的理據還與語言其他因素以及所處語境有關(會參308-309頁)。書中仍以上述「睡覺」的「覺」義演變情況為例，認為「覺」本義「睡醒」是個自動詞(不及物動詞)用法，引申而有「領悟」和「啟悟」義，因而又有「使醒悟」義，成為一個他動詞(及物動詞)用法。又指出戰國時又與「悟」組成「醒悟」這一同義並列複合詞；佛教傳入中國後，「醒悟」又蘊有宗教的意味。隨後「覺」在語言中表示「領悟」和「啟悟」義的頻率漸漸超過它所表示的「睡醒」義，「覺」的「睡醒」漸為「醒」所包容取代，「覺」亦漸由表「睡醒」的動詞義演變為表示從睡著到睡醒的「睡眠」義和「睡一覺」的動量詞詞義(會參309頁)。循是論述，認為「覺」的表「醒悟」義和「睡一覺」的表動量義讀音有變化；「睡覺」可拆開說，說成「睡午覺」、「睡了一大覺」、「睡懶覺」、

「覺睡夠了」等，語法結構鬆散。在此基礎上，本書認為詞義生成的機制既可能在於它本身意義系統的內部，也可能來自它與其他詞的外部聯繫；詞義的演變理據不僅與其本義有關，也與它和其他詞的組合關係有關，甚至也可能與語言的語義結構格局的調整有關〔會參310-312頁〕。反覆展敘，著意兼明如下諸語言事實，足資旁及研究的參鑒：

第一、反義詞組成的並列詞組的發展演變情況是很複雜的，舉「睡覺」特資隅反，由此及彼。如「動靜」在《易·繫辭上》「動靜有常，剛柔斷矣」中是運動和停止的意思；在《漢書·西南夷傳》「太守察動靜有變，乃以聞」中合指情況；現代漢語「外面有甚麼動靜」的「動靜」，一方面是偏義現象，另一方面也是引申成「情況」的意思。又如「不識好歹」的「好歹」原指「好壞」，後指意外、不如意事；無名氏《連環計》第三折「若是酒宴上有些好歹，就將這老匹夫結果了罷」，《紅樓夢》第二十九回「寶玉見黛玉病了，心裏放不下，飯也難著吃，不時來問，只怕她有個好歹」，兩例中的「好歹」都是這一含義；此外又有「無論如何」的涵義，無名氏《鴛鴦被》第一折「你好歹早些兒來回話」的「好歹」正是如此。至於現代漢語，「不識好歹」的「好歹」意義已偏重在「好」上，「萬一有個好歹」的「好歹」，意思又偏重在「歹」上。複雜性僅此可見一斑。

第二、反義詞間的音義關係，由「睡覺」〔例析見310頁〕亦可會通反義詞的各系列。反義詞是「一個範疇的兩個側面」，「義反音亦反」是上古漢語單音節反義詞產生的一條重要規律。這種語音對立有多種表現：可以是陰聲韻、陽聲韻與入聲韻對立，可以是陰聲韻與陽聲韻對立，可以是陽聲韻內部m、n、ŋ之間的對立，可以是入聲韻內部p、t、k之間的對立，也可以是主要元音對立。種種對立是古人力圖從語音上劃出界限以利加強反義詞的表達效果（說參何九盈、蔣紹愚《古漢語詞匯講話》）。上古「睡」歌韻、禪母、去聲，「覺」覺韻、見母、入聲，是陰聲韻與入聲韻對立，後代才入聲消失，「覺」歸入去聲韻和陽平韻（「覺悟」）。「睡覺」聲音對立及其演變軌迹，對一系列反義詞的音義溯源具有普遍意義。

第三、漢語詞義的引申和語法作用的變動，關係亦甚密切。作者指出「覺」的本義「睡醒」是自動詞，引申而有「領悟」和「啟悟」義，因而又含有「使醒悟」義，成為一個他動詞〔會參309頁〕。說的是「覺」的詞義引申引起語法作用的變動，實際上展示了漢語所有動詞的有關實際。在漢語裏任何一個自動詞，為要表示使動意義，都可以用作他動詞，不特「覺」而已。所以呂叔湘說，在漢語裏「與其說動詞有及物和不及物兩類，毋寧說是動詞有及物和不及物兩種用法」（《語法學習》114頁，中國青年出版社，1953年版）。「死」是個地道的不及物動詞，可是「你死了這條心吧」的「死」就是及物動詞了（使「這條心死了吧」）。不難看出，這一規律施於漢語語法的研究是如此，施於漢語詞義演變的研究也是如此，本書從「覺」義歷史演變提出問題，實際上是重申了呂叔湘揭示的一條重要的漢語語法規律，這條語法規律與詞義演變密相照應。了解這一實際由點及面，促使認識納入科學軌

道。呂叔湘上述真知灼見未必盡人皆知，故兼轉述如上，並引為本書之補證。

前面著重從反義詞的意義聯繫、聲音聯繫、語法作用的聯繫酌加透視。此外，語詞的外來影響、詞義演變與漢民族語言的周邊聯繫，也不容忽視，本書多次有所提及〔會參311頁〕，這兒不再復敘，其理亦明。

本書對詞語的考釋提倡「始見書，初見義」的詳盡求證，並以「賬(帳)」為例作了闡發。這一闡發，有利於詞語考釋的深化。作者指出漢語中表示「登記入戶、賦稅等的記錄和記賬的書冊」詞義的「賬」，唐代以前用「計」來表示，唐代則用「帳」來表示。我國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逐水草射獵，帳篷是這些民族的主要居室，每戶住一頂帳篷，帳也就成為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計算人戶的單位。其詞義與中原及南方一帶所用的「戶」相當，引申而有「戶數」義。「帳」字此義在漢語中的使用與當時我國北方漢族與西域少數民族的交往群處有關。「帳」在北方游牧部族中有「戶數」義，這就使「帳」在詞義上與先秦兩漢時表示統計戶口多少等情況的「計」有了聯繫。這兩字的考釋，印證了兩個問題：

第一、漢人祖先語素文字的創造基於漢語的研究，所以以形索義在一定程度上提供語詞考釋的依據。《說文》重文列有「𦉳」形(像帳形)，說是「古文次」；《周禮》有掌次之官，鄭玄注「次為幄，帳幕也」，它是游牧民族主要居室，也是軍隊在郊外作臨時住宿用的篷帳，又由臨時住宿用的篷帳引申為軍隊的駐扎，《左傳·僖公四年》「師退，次於召陵」便是駐扎義。居民的居住和軍隊的駐扎，同樣要記數，「帳」的意義自明，啟發了人們印證「帳」的本始義。

第二、漢人的傳統文化也提供了考釋語詞的依據。作者說登記戶口、賦稅等，唐代以前用「計」來表示，唐代則用「帳」來表示。「計」的起源很早，它的實際含義就是「計算」，即用一種叫「算」的計劃工具進行計算。「算」用竹木小棍製成，也叫「籌」和「策」，所謂「定計」、「運籌」、「決策」，都是指出兵前用這種竹木小棍計算敵我雙方實力優劣的過程和方式。弄清這種實用文化的名物制度，對後起的引申義的理解便迎刃而解了。本書研究的對象是古白話詞匯，可是提倡「始見書，初見義」，從高層次上探源析流，自可洞明詞義的來龍去脈。

7、關於詞義的發展和詞義系統

本書酌參王士元《競爭變化是造成剩餘的一個原因》一文關於詞匯擴散論的理論，進一步證明詞匯擴散作為一種變化形式不僅僅在語音上出現，而且也在語言的其他方面出現。本書這一觀點是值得讚賞的。本書又指出《朱子語類》中「東西」的雙疊形式「東東西西」，據上下文文意可理解為指四面八方，也可理解為泛指各種物品，體現了「東西」一詞由泛指四方漸凝固為通稱各種事物或抽象事物的趨勢〔會參440頁〕。這一例說很具參照價

值。它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現代漢語裏，「東西」是個常用詞，人們也常在議論中，可是認識未盡一致。我們先不管《說文》與甲骨文對「東」「西」形義的分析如何，古籍中「東西」一詞泛指方向（東方和西方），早已見於先秦：「水波遠以冥冥兮，眇不睹其東西。」（《楚辭·九嘆·遠逝》）「人性之無分於善與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告子上》）後來可指「外出」或「產業」。又發展為泛指一切物件。「這都是別人的東西，不要弄壞了。」（《儒林外史》第三回）也用作對人和對物的厭惡或喜愛之詞：「但犯著吃黃蘗者，不是好東西。」（《元曲選·馬致遠青衫淚》三）「這小東西真可愛。」（《現代漢語詞典》）由於詞義發展，現在有人不知本原，在《為甚麼把物件叫東西》一文中寫道：在我國古代把木、火、金、水、土稱為「五行」（分別代表東、西、南、北、中五個方位）；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稱為「天干」，又把「五行」、「天干」對應起來，組成五方，即：東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可以看出，東方屬木，可以代表一切植物、花草、樹木、蔬菜、莊稼等；西方屬金可以代表一切金屬礦物，如金、銀、銅、鐵、錫等；南方屬火，火是一種化學現象；北方屬水，嚴格說來，水也是一種化學現象。然而，在遠古時代，人們可能不把水、火當做物質；至於中方的土，由於遍地皆是，以致被古人忽視。由此看來，只有木（植物）和金（金屬礦物），最受人們的重視，可以代表一切有用物質。於是，人們就把代表「木」和「金」的兩個方向名聯在一起，組成了一個詞——東西，用它代表世界上所有物體（陳文華摘自《北京晚報》1981年11月4日）。這樣的解說，游談無根。因而有人指出：「物產於四方，約言之曰東西，猶記四季而約言春秋。」（新版《辭源》）這本來是很明白而合乎情理的，然而《北京晚報》文既無所本，又以十分肯定語氣出此玄而又玄的新議，進而反駁說：「果若如此，我看當初不如把物件叫『南北』或『南北中』更為合適；因為物體的製成一般少不了火，缺不了水，而土又能生萬物。」（虞、江摘自《北京晚報》1981年11月14日國念文）

倒是有位哲學家說得較合乎事理：物有正反兩面，古人以東西概之（大意如此）。

本書作者所舉《朱子語類》「東西」又說「東東西西」用例，表明「東西」由泛指四方而通稱各種事物，言簡意明，提供實證。若更益以史實，旁參哲學見解，尤為今人之索解提供必要的書證〔會參本書作者《「買東西」考獻疑》一文，載《歷史研究》1998年第2期〕。

本書對詞義系統的看法：不同的詞在詞匯系統中各有自己的位置，並相互聯繫。詞匯成分之間存在語音、語義、詞匯、語法、文字等聚合關係。其間某一個詞匯成分為輻射點，沿著其聚合關係輻射開去，就會形成無數個以之為核心而聚合其他詞匯成分所形成的聚合網絡。每個輻射點可以是一個詞匯成分，也可以是由多個詞匯成分構成。構成輻射點上的每一個詞匯成分又都可以作為一個新的輻射點形成一個新的輻射聚合，所有的輻射聚合聯繫在一起就形成了詞匯系統的聚合網絡，每一個詞匯成分在這個聚合網絡中有確定的位置〔會參356頁〕。詞匯系統的核心是詞義系統，詞義系統首先是以邏輯為基

礎的封閉系統，而後漸由以經驗為依據的開放系統擴展。在發展過程中，既有連鎖性的，又有輻射性的，並且二者往往相互交錯。古白話詞義有其歷史延展性，也有其地域延展性，有的至今沿用，有的保留在方言中，有的卻完全消失了。本書有鑒於此，強調「古白話詞語研究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梳理出詞的意義系統」。誠然，詞匯系統和意義系統息息相關，在詞匯系統問題上語言學界的認識很不一致，但詞義系統的存在是無庸置疑的。本書不纏於詞匯系統的紛議，直接憑對詞匯系統的己見提出詞義系統的梳理，辭約理彰，有利於人們認識的推進，也有利於詞匯系統的科學分析。表面看來本書有似混一了詞匯系統與詞義系統，實則基於相輔相成的視角。

8、關於古白話詞典的編纂

1998年9月在石家莊市召開的首屆中青年辭書工作者學習研討會將「如何將漢語詞匯學研究成果用於辭書編纂，在辭書中對詞語進行科學、準確、全面的釋義」列入會議的首項議題，90年代劉叔新在中國語文研究四十年紀念會上提出詞典學不包攬在詞匯學之內，免「使詞匯學不能集中研究詞匯本身」（《中國語文研究四十年紀念文集》，1993）。本書作者根據多年從事大型漢語詞典的編纂工作和古白話詞匯研究實際體會，認為古白話詞典的編纂和古白話詞匯的研究是相互促進的。明確指出大型漢語詞典的編纂應注重收錄詮釋歷代白話典籍中字面生澀而義晦及字面普通而義別的常俗白話詞。新編漢語詞典要在前人的基礎上取得超越前人的成績，就必須重視古白話詞匯的研究，致力於舊時字書所不屑道或未曾覺察到的常俗用詞的詮釋，填補前人的空白，從而增強詞典的科學性和實用性（會參378頁）。同時強調專書研究最基礎的工作是對漢語進行共時靜態描寫。研究專書詞匯不僅僅在於一詞一義的詮釋上，而更在於將詞匯看成一個系統，從結構、意義、詞性、語序和修辭等各個角度進行綜合研究，多方面描寫整個詞匯的面貌，揭示漢語詞匯發展的特點和脈絡。專書研究還要注意抓住某一斷代的漢語某一現象探源析流，在靜態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縱向的歷史比較和動態分析。通過比較不同時期漢語現象的異同，來把握漢語詞匯的歷史發展。專書詞匯的研究要將定性分析同定量分析結合起來，運用統計的方法，以大量的觀察為基礎，通過數量統計來揭示漢語詞匯豐富發展的規律性（會參384頁）。隨後以胡竹安《水滸詞典》、李法白和劉鏡芙的《水滸語詞詞典》、王利器《金瓶梅詞典》、白維國《金瓶梅詞典》、周汝昌主編的《紅樓夢詞典》、周定一和鍾兆華等編的《紅樓夢語言詞典》為典型作了周詳的比較分析，為專書語言詞典的編纂提供了範例和理性依據（會參386-400頁）。本書作者長期參編了大型詞典的編纂工作，上述無疑是自身經驗之談。

以上是關於內容的評賞。另外值得提出的是本書注重研究方法的總結和探討，十分

重視學科方法論。

我們暫不說哲學含義的方法論，也暫且不專門從理論上詳釋思維過程的各種方法論和思維過程中理論工具運用的各種方法論，只談各具體學科方法論，兼及學科中思維方法論和理論工具方法論的運用。各種學科都包括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詞匯學科研究重視方法論是不言而喻的。有成就的學者向來重視方法論，王力《我的治學經驗》第一條經驗便是要有「科學方法論」(共談八條經驗，餘從略)。季羨林也指出：「這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不管搜集了多少材料，如果方法不對，那麼材料都毫無意義。」「雖多亦奚以為？」(《印度語言論集》43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從漢語史上看，詞匯學創始得很早，然而科學的詞匯學的產生卻是較晚的，詞匯學科方法如何尚無定說。況且持不同見解的，研究視角與方法也往往有所不同，就拿已經出現的語法學科而言，除了中心詞分析法之外，著眼於語言的線條性，就出現了線性分析法；把語言結構理解為層次結構，就出現了層次分析法；把語言結構理解為抽象的模式，就出現了模式分析法；把語言理解為由深層結構生成的表層結構，就出現了生成——轉換分析方法等等。語法研究的歷史已經不太短，研究視角與方法尚且如此不一，科學的詞匯學產生及研究較晚，科學內容又無比複雜，人們對它的研究還很不深入，尤其是古白話詞匯研究，起步更晚，一套成熟的方法論誠然說不上，但本書從對古白話研究的實踐中提出重視方法論問題，應是學界的共識。

本書首先論述了古白話詞語研究的方法和釋例，指出在具體考釋詞義的過程中，往往需要將多種方法結合起來加以運用，從不同角度對詞義作綜合的考察，從而提高考釋的精確性和可靠性。作者贊同江藍生《演繹法和近代漢語考釋》(1998)的見解：「考釋詞義，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是歸納法，即把搜集到的有關語言材料加以排比，根據上下文推敲玩味，從而歸納出某一詞語的意義。」「當歸納法難以奏效時，我們可以嘗試用演繹的方法來另闢解決問題的蹊徑。」這是思維方法論在詞匯學科的有效施用(會參420頁)。誠然如此，語言研究，無論古代、近現代，應重在歸納，並馭以演繹。歸納與演繹是兩種十分重要的邏輯推理方法，它們在認識語言現象過程中各有特定作用與地位，這是已被無數研究事實所證明了的。本書的認同並施之於研究實際，自然利於奏效。這一成效的取得自然是與思維方法論的準確運用分不開。

本書其次是施以思維過程中理論工具方法論在詞匯學科中的運用。本文前面講到全書內容的第一方面就說過語言的系統，在空間結構和時間結構上存在有序性，佈局與發展有其規律性，本書即從這一系統論觀點出發作有關申論。末了我們還必須進一步強調的是，現代科學技術發展中充當思維過程中的理論工具之一的系統論，要求人們把客觀世界看作統一整體(其中各個對象互相聯繫，互相制約)，這統一整體寓有時空結構上的有序性及其佈局發展的規律性，語言也沒有例外。作者意識到語言是一個系統而加以研

究，所以深有體會地指出：「古白話詞匯時間跨度大，詞義變化繁富。古白話詞匯的歷史發展不是單一的線性流程，也不是各斷代系統簡單對應的靜態延續，而是處於既有不同時間上的縱向傳承和垂直對照，又有同一時間平面上空間橫向影響的縱橫交錯，相輔相成的立體狀態。詞匯體系中各個單位在共時條件下語義上處於彼此制約、聯繫的平衡狀態，新成分的出現或舊成分的消失都會打破原有的平衡機制，導致詞義再分配並引起詞義的發展演變。因而，運用時間上的縱向探源和空間上的方言比較，進行縱中有橫、橫中有縱的辨證分析，在共時與歷時交叉的焦點全方位的綜合考察古白話詞匯的發展，這對推廣漢語詞匯史的研究有重要意義。」〔會參422頁〕這正符合系統論原理的研究，應該首肯。

此外，本書還運用了思維過程中理論工具方法論的數學方法論。強調在有可能和必要的情況下，對專書語詞進行窮盡性的分析，有時或選取某些有代表性詞例對一些辭書和考釋著作加以補證。如考釋「快活」一詞除一般辭書所載的「快樂」義外，尚有「明白通暢」和「乾脆爽」快的意思，補《辭源》和《漢語大詞典》此義的失載。類此，僅從《朱子語類》便補證了28個古白話詞語〔會參432-433頁〕，資以說明古白話語詞的詮釋任務正十分繁複，不能等閑視之，值得加倍關心。呂叔湘一直很關心這一實況，他說過「那」這個詞，除與「這」相對外，還可以作「另外」講，例如「今天的月亮只看見一半，我問你，那一半為甚麼看不見？」現在的字典、詞典沒有這個義項（《呂叔湘語文論著》372頁，商務印書館，1983），呂叔湘當然僅是示例而已，今後群策群力，來一個全面的統計分析，必將大大豐富現代漢語的語庫。現代漢語既然如此，近代漢語亦當如此。

面臨信息時代，本書前面已經提到，隨著文獻信息載體向網絡化、電子化發展的趨勢，古白話的研究也將逐步以新技術、新方法取代傳統方式〔會參142頁〕，作者有鑒於此，並身體力行，這跟信息論意識的增長分不開。

各種方法有其自身的核心要求，但對方法的駕馭常趨於綜合的運用。作者認為古白話詞匯、詞義系統需借鑒先進的理論和解決研究手段的現代化，使用計算機來統計處理和分析字詞頻率，進行窮盡分析〔會參453頁〕。這就包括了系統論、數學論、信息論等方法的綜合處理。有系統就有控制，牢牢把握語詞時空的有序性，可見語詞發展的規律和網絡。窮盡分析的前提得有定量，設使在古白話已有「定量」的前提下進行定量分析，正確性會有保證；否則，難免出現偏差，甚而得出的結論是荒謬的。語詞符號是信息的中介（暫且這樣說）；「語言是傳遞消息的一種信號，標記語言的文字也是一種信號」（趙元任《語言研究》9頁）；「是人跟人互通信息，用發音器官發出來的、成系統的行為方式（同上3頁）。語詞的信息不同於一般信息，如上所述，涉及到形（「標記語言的文字」）、音（發音器官發出來的）、義（邏輯心理現象）、成系統的（基於理智的連續體）、人跟人互通信息的行為方式（交際工具）。凡此，本書的研究未嘗忽視，並提出今後研討的取向，當是至理

明言。

本書以「論稿」命名，顧名思義，似有冀在此書的基礎上續有補正。如作補正，有數處不妨連同考慮：

一是第五章構詞法的研析嫌簡略，且語音構詞未曾涉及，有待補充。

二是全書多次提到由量變到質變的問題似尚可斟酌。通常說「語言的發展是漸變的，不是爆發的」，作者的意思似是認為語言漸變到一定程度即由一個階段發展到另一階段，從而完成了從前一階段到後一階段的質變。關於這一點未從理論上加以闡發，易生費解乃至誤解。

三是多次強調語詞的窮盡性分析，這從目前白話語詞研究的現狀看，條件是否都成熟，還得作哪些努力，最好也有所交待。

總的說來，徐時儀《古白話詞匯研究論稿》是一部很有學術價值的著作，也是迄今為止第一部較好的古白話詞匯研究的教科書。其間要義，特別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一是相當全面地介紹了古白話詞匯研究的主要內容，介紹了有關的古白話文獻資料，還對文獻資料的斷代鑒別和使用等作了分析。

二是總結了古白話詞匯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研究方法並施之於自己的研究實際，幫助讀者了解古白話詞匯研究的現狀和今後的努力目標。誠如張斌教授為本書所寫的序中所提到：「作者長期從事古白話的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在方法上和理論上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這些在本書中都有體現。」誠為繼往開來，成效卓著。